

笛卡尔哲学思想的本体论语言哲学解读

肖志红

(长沙医学院,长沙 410219)

提 要: 语言哲学不仅包括分析性语言哲学,而且包括本体论语言哲学。但是,本体论语言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有待研究。本文以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为对象,提取其语言哲学内容,为本体论语言哲学服务。

关键词: 笛卡尔;方法论;知识基础;本体论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3)03-0082-5

Explanation of Descartes' Philosophy from the View of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Xiao Zhi-hong

(Changsha Medic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19, China)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ot only includes 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ut also includes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owever, as to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re still exist so many basic problems to be studied. This article takes Descartes' philosophy as research subject. By drawing content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rom his whole philosophy, this research serve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Key words: Descartes; methodology; basis of knowledg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 对笛卡尔的总体性反思

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的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他建立了近代哲学的第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以“普遍数学”为方法论,根据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论原则,把“自我”作为第一原则,建立了“清楚明晰”的真理内在标准,一步一步推导出有关心灵、上帝和外在世界(物质)的确定知识。就语言哲学而言,笛卡尔的价值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他对人类知识基础的追问和研究与整个西方哲学研究的主线吻合,并且把这一主线向前合理地延伸。西方语言哲学家不应该也不能够局限于具体语言现象的经验分析,更不能满足于“瞎子摸象”的现状,必须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哲学或人文精神发展的主流,为人类的永恒主题——通过揭示人和人的世界,从而发现人性,发展人性,最终完善人性——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二,通过“我不怀疑我怀疑”和“我思故我在”,将研究人及人的世界这一重大课题直接聚焦于人的精神(思想)世界。这为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和

理论基础。要知道,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研究方法是分析和解释,研究目的是揭示人及人的世界。语言的产生、存在,离不开人及人的世界,尤其离不开人的意识行为(思想);语言的意义是人及人的世界,语言的范围是“人存在的世界”(阿鲁玖诺娃 2012),凡是人“触及”的都会通过符号化固着于语言之中,不多也不少。质言之,语言就是人及人的世界,人及人的世界栖息于语言之中。难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说,全部哲学就是“语言的批判”(维特根斯坦 1992: 38)。

针对本文的论题,下面将选取笛卡尔的“方法论”、“我不怀疑我怀疑”、“我思故我在”、“真实标准”,从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角度出发予以反思。

2 笛卡尔(知识)基础探索

笛卡尔生活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他首先从方法论角度摧毁旧的经院哲学体系的基础,同时证明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合法性。他的《方法

谈》和培根的《新工具》一样,为理性时代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赵敦华 2001: 183)。

普遍数学 笛卡尔坚持统一的科学观,认为所有具体科学都应该统一在哲学之下。就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他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哲学是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自然科学),树枝是医学、力学、伦理学等应用学科。笛卡尔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是从树根、树干,而是从树枝采摘果实的,所以哲学的主要功能和价值首先体现在其各部分的具体功能和价值上;然而,其本身(哲学的功能和价值——引者),我们只有在洞悉各部分的具体功能之后才能捕着到”(Veitch 1948: 119 - 120)。

在笛卡尔看来,实现科学统一性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因此哲学首先应该考察科学方法。他认为数学方法是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方法,只是数学家没有反思它,于是反思方法的任务就落在了哲学家的肩上。他说,古代的几何和当代的代数都具有狭隘和晦涩混乱的缺点,“应当去寻求另外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方法”(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2: 364)。笛卡尔所说的科学方法就是“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

普遍数学把数学的最一般特征——“度量”和“顺序”运用于其他学科。笛卡尔从哲学出发,论证将这两个特征运用到其他学科的合理性。他认为,数学的“度量”只是量与量之间的比较;在运用到其他学科时,我们可以把度量转化为不可量化的对象之间的同、异比较。例如,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异质的,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但是可以通过概念比较来捕着不同对象之间性质和程度两个方面的同和异。因为任何研究对象都具有同、异特点,所以通过这两者可以将该学科所有研究对象统一起来。

在理想状态下,科学研究存在两种顺序:一是从简单到复杂的综合,二是从复杂到简单的分析。在数学中,上述两种方法由于研究对象同质而可逆。但是,哲学不同。比如,形而上学对因果关系的研究:终极原因是无限的上帝,上帝创造的事物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原因和结果异质,从原因推导不出结果。于是,形而上学不能直接诉诸无限的终极原因,须要寻找一个确定无疑并且简单明了的出发点,由此出发建构有关原因、结果的知识系统。从方法论着眼,形而上学的方法首先是分析,通过分析找到确定的第一原则,然后使用综合,从第一原则推导确定的结论。

方法论规则 按照先分析后综合的顺序,笛卡尔建立起 4 条方法论规则。它们分别是“第一,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第二,把我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第三,按次序进行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设定一个次序。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笛卡尔 2000: 16)。赵敦华对这 4 条规则的关系有过恰当的分析:“上述规则的第一条说明分析的必要性,指出分析的目的在于找到无可怀疑的、确定的‘阿基米德点’;第二条说明分析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分析的结果要尽可能地细致,细致到可以加以满意地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指综合的过程,从分析的结果出发,由简单的、确定的真理一步一步推导到复杂的道理;第四条指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不能半途而废,分析要彻底,综合也要全面,才能达到完全的真理。这四条规则都没有经验感觉的地位,分析和综合都是理性的方法”(赵敦华 2001: 185)。须要补充的是,无论“认识”、“接受”、“判断”、“审查”还是“思考的次序”、“全面地考察”、“普遍地复查”,都属于人的思想活动或行为;同时,笛卡尔对思想研究的切入维度,不是证实而是证伪,即从否定方面考察人的思想。前者凸现出他的研究范围,后者体现出其研究出发点——怀疑。

3 我不怀疑我怀疑

笛卡尔认为,现有的一切知识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之上。为了重建知识,必须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建构哲学基础好像盖房子一样,只有基础打牢了,才能在这个地基上一砖一瓦地建筑知识大厦。为了打牢地基,首先要清理地基,即,取消所有的不可靠知识的基础地位。“不可靠”不一定等于“不真”,而只是说,这些知识没有经过充分的考察,不能成为知识的基础。“因为基础一毁整个建筑物的其他部分必然跟着垮台,所以我将首先打击我的旧意见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2: 366)笛卡尔的打击策略是怀疑方法,凡是不能通过怀疑检验的原则,都要排除在知识的基础之外。

在笛卡尔开来,怀疑具有普遍性,人们一般认为不可怀疑的确定性都在怀疑之列,包括周围世界、我的身体和数学的观念。于是,笛卡尔从讨论不同系统的知识切入,用有条理的怀疑来检验这些知识,从而建立自己的普遍怀疑观。

第一,哲学传统是可以怀疑的。“原则上有无可能怀疑哲学家们已经说过的话?有可能……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在许多方面意见不同。”(希尔贝克 & 伊耶 2004: 235) 既然过去的意见与现在的意见不同,那么现在与将来的意见也可能不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其现在的意见。也就是说,哲学家的意见或观点值得并且应该受到怀疑。

第二,周围世界是可以怀疑的。周围世界是感知到的现象,既然我们有被感觉欺骗的经历,感觉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周围世界是可以怀疑的。于是,“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不能成为知识的基础”(赵敦华 2001: 185)。其实,在我们看来,造成欺骗经历的是人的感觉,不是周围世界,应该怀疑的是感觉而不是周围世界。周围世界要成为知识的基础,必须首先成为知识。周围世界一旦成为知识,就不再是自在的周围世界,而是它的“图像”或“形象”(维特根斯坦 1992: 28, 38)。图像与其原型当然不一样,其间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人的意识行为之一——感觉,而感觉是人的感官的一种功能。于是,感觉和感官就成为普遍怀疑观反思的对象了。

第三,我们自己的感觉是可以怀疑的。笛卡尔以我们有时会陷入幻觉和错觉为例予以论证。比如,一座塔远看是圆的,但是一旦走近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方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远看这座塔所得出的圆的感觉是错误的。这个例子昭示人们,我们的感觉可能出错。因此,从原则上讲,所有感觉都可能出错。于是,我们的感官是无法向我们提供演绎的哲学体系的绝对确定的前提的。这样,我们的感觉或产生感觉的感官都是可以怀疑的。

第四,数学观念是可以怀疑的。在笛卡尔看来,数学观念是简单的,因而是清楚、明白的,好像是有不会错的,“因为不管我醒着也好,睡着也好,二加三总是等于五,正方形总不会有四条以上的边;这样明白、这样明显的真理,看来是决不会有任何虚假和不确实的嫌疑的”(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2: 367)。但是,即使像数学观念这样明白、清楚的对象,也是可以怀疑的。笛卡尔指出,数学是我们思想的对象,但思想的对象是可以怀疑的;

因为可能有一个“邪恶的精灵”,他恶作剧般地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对象置于我们的心灵之中,使其成为我们思想的对象,但这些对象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来自一个错误的根源。笛卡尔使用了“邪恶的精灵”的想象,好像不太严肃。但笛卡尔确有受幽灵蛊惑的梦境经历,他非常严肃地说:“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是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2: 368) 从理论上分析,“邪恶的精灵”的假设涉及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自毕达哥拉斯以来,哲学家一直在追问数学基础的问题:数的观念从何而来?它们有无外部原因?有无客观的实在与其对应?因为这些问题尚无确定的答案,我们无法肯定数学的观念是清楚明白、确定无疑的。就是说,未经哲学的论证,自身基础不稳的数学同样不能成为知识的第一原则。

最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处于方法论中心的逻辑论证也是可以怀疑的。要证实一系列论证,除了运用某一系列之外的其他系列的论证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然而,“如果第一串论证原则上是可错的,其他串论证原则上也可能是可错的。因此,原则上我们也可以怀疑逻辑论证”(希尔贝克 G. & 伊耶 N. 2004: 236)。

从方法论角度审视,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属于分析范畴。他的分析从复杂现象(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开始,经过比较简单的现象(关于我们自身的观念)达到简单的数学观念,最后是论证方法。在笛卡尔看来,无论哲学传统、周围世界、我们自己的感觉还是数学观念、逻辑论证,都是可以并且应该受到怀疑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一切(知识——本文作者)都值得怀疑,概莫能外。对此,笛卡尔提出下列思想实验,予以佐证。想象存在一个强大的恶魔(un malin génie),他在欺骗我们,我们因此出错。也就说,存在一个“邪恶精灵”,他不知不觉地向我们灌输错误观点。这样,我们将无法对我们知道的东西抱有信心。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不被这个邪恶精灵欺骗,是否存在检验我们怀疑的东西的标准?根据分析要考虑一切可能性这一规则,笛卡尔考虑最后剩下的一种可能性:思想能否怀疑自身。笛卡尔的回答是否定的,从而找到了一个不可怀疑的第一原则,即“我不怀疑我怀疑”。

4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说,思想可以怀疑外在对象,可以怀疑

思想之内的对象,甚至可以怀疑一切,但却不能怀疑我们自身在怀疑。思想自身是思想的活动,当思想在怀疑时,可以怀疑思想的一切对象和内容,但却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否则怀疑就无法进行。并且,怀疑活动一定要有一个怀疑的主体——“我”;这样,由于想到我在怀疑,可以确定地知道作为怀疑主体的“我”是存在的。

由此,笛卡尔得出了一个普遍结论“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王太庆将 I am 译为“是”。其实,无论译为“在”还是“是”,都不好,但又很难直接译成汉语。正是这种困难,昭示我们语言哲学的价值:哲学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它用自然语言,也就是民族语言编码;要研究人及人的世界,就得分析和解释对地方性知识编码的自然语言。我们暂时采用“在”,即“存在”的译法。这个命题有两个部分“我思”和“我在”。“我思”指思想活动。那么,什么是在思想的东西呢?笛卡尔说,“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笛卡尔 1986: 27)。须要注意,“我思”包括一切意识活动,不管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抑或是情感的,都属于“我思”。更重要的是,“我思”是没有内容的纯粹活动,如果它是有具体内容和对象的思想,那么它也就是可以怀疑的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思”是以意识活动为对象的自我意识,即后来哲学家所说的反思的意识。笛卡尔虽然还没有用“自我意识”、“反思”这些词,但他已表达出这样的道理:一切思想活动的核心是对这些活动的自我反思。他说“当我看的时候,或者当我想到我在看的时候(这两种情况我是不加分别的),这个思想的我决不可能不是同一个东西”(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2: 372)。就是说,思想的活动同时是反思的活动,当我在看、在想的时候,我必须同时意识到我进行这样的活动,由此,笛卡尔没有区分思想活动与对于这一活动的意识。当我在看或在想的时候,我可以不看、不想任何对象,但对于“我在看”或“我在想”的活动本身,却不可能没有意识。

笛卡尔又说,思想的主体和反思的主体是同一个主体,主体就是实体。“我思”和“我在”中的“我”是同一个实体。“我思故我在”中的“故”表示的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本质和实体之间的必然联系。从逻辑上说,“故”也不表示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我思”是该实体的本质,“我在”是该实体的存在。笛卡尔认为,人们只能通过属性来认识实体,每一个实体都有一个

特殊的属性,这就是它的本质。从自我的思想活动,我们可以得到自我必然存在的结论。就是说,“自我”是一个这样的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2: 369)。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全部哲学的出发点。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确定了自我是一个思想实体,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思想的具体内容。笛卡尔下一步的工作是从这个我们迄今为止唯一可以确定的命题出发,推导出其他的确定知识。我们须要了解,从自我实体出发的推导不是仅仅在思想范围内的演绎,它需要从自我的思想领域过渡到思想以外的实在领域。思想与实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须要使用笛卡尔提倡的“普遍数学”中的“度量”来克服不同性质的对象之间的隔阂。正如上文所说,数学的“度量”在形而上学中是一种比较。要进行比较,就需要一个共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衡量不同性质的对象的不同和异。

笛卡尔诉诸自己已经确立的第一原则来确定这个标准。他认为,“自我”观念本身就是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一切像“自我”那样自明的观念都是真观念。笛卡尔指出,“我觉得我已经能够把‘凡是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白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这一条订位总则”(笛卡尔 1986: 35)。这一规则的建立是笛卡尔方法的转折点,使得他能够从分析过渡到综合,使得他能够用这个标准衡量复杂的对象。按照这个标准,那些在分析步骤中被怀疑的观念重新被确定为真观念。比如,在普遍怀疑的步骤中,数学观念的简单、明白不足以为真,因为它们缺乏根据,我们不知道它们何以为真。在综合步骤中,通过比较“自我”观念,清楚明白的数学观念的真实性最终被确立。

笛卡尔把所有的观念分为天赋、外来和虚构的三类。其区分标准是照观念的来源。虚构观念是思想自己制造出来的,天赋的和外来的观念都是由思想以外的原因所造成的。笛卡尔接着证明,思想自己创造出来的观念是不真实的,而在外部原因所造成的观念中,有一些是真实的,有一些是不真实的。前者指上帝创造的观念,后者指可感事物形成的观念。

综观笛卡尔的真实标准,可以概括为:一是作为思想主体自我的理解、领会;二是理解、领会的东西要清楚、明白。

5 语言哲学价值

关于笛卡尔及其学说,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

法是:唯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实现从中世纪上帝论和经院哲学向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先驱之一;从普遍怀疑出发,以人的思想(认识)为核心,重构知识基础。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因此受到批判。本文不打算全面批判笛卡尔及其思想,也不打算参与唯物、唯心方面的争论,仅仅从欧洲大陆本体论语言哲学出发,考察其相关思想。

方法论方面的价值 放眼当今学术界,语言研究,无论是语言学还是分析性语言哲学,大多崇尚分析,一是将大一些的语言单位分析为小一些的语言单位,大有越细越好的普遍癖好或发展趋势;二是集中分析语言某一局部的单位或现象,呈现出“瞎子摸象”的研究态势。尽管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在把握语言整体性本质上凸显出严重缺陷,亟须在关注语言具体分析的同时,更加须要开发将对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语言局部分析的成果整合起来的研究方法,以期把握整体性语言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然而,笛卡尔早在 17 世纪就提出统一科学观,并将只适合数学的度量和顺序方法改造成同、异探讨方法,使其可以适合哲学等其他学科,不仅令人赞叹,而且整合上述两个学科的具体研究成果,突破学术界的上述局限。

笛卡尔认为,实现科学统一性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因此哲学首先应该考察科学方法。就语言哲学而言,其学科目的是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研究对象是语言。既然目的和研究对象同一,那么要实现语言哲学各流派的语言局部研究成果的统一,对该学科研究方法的探索就既迫切又重要。我们认为,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分析,也不仅仅是解释,而是既分析又解释,分析是基础,解释是核心。

“我不怀疑我怀疑”与“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要用自己的方法找出一条清楚、明白的原理,作为其形而上学,首先是认识论的出发点。对此,他指出,我可以怀疑这,怀疑那,甚至怀疑一切,但是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我怀疑,就是我在思想。即使我在做梦,也是在思想。既然我在思想,就不能没有思想的“我”。也就是说,“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这是笛卡尔建构自己理论大厦的出发点。

无论怀疑本身,还是怀疑的对象,比如希望、

相信、判断、喜欢、憎恶等,都属于一个范畴,那就是思想,准确地说,是思想这一行为。而且,所有思想行为的主体必然是人。笛卡尔将人这一主体限制在第一人称——“我”之上。这样,笛卡尔通过思想与怀疑以及主体——“我”这两个同一,向我们昭示:一切东西一旦成为知识,就值得怀疑,不能在成为基础,唯一不能怀疑的是“我怀疑”;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从此开始转向人的思想行为及其所关涉的世界,而不再在无边无际的大全世界中盘旋。

真实标准与上帝存在的证明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笛卡尔真实标准的核心在于:一是作为思想主体自我的理解、领会,也就是主体“自我”及其思想行为(理解、领会)是其真实标准的基础;二是理解、领会的东西要清楚、明白。显然,笛卡尔的真实标准与“我不怀疑我怀疑”和“我思故我在”在实质上一脉相承,重心都在第一人称的人及其思想行为上。

总之,西方哲学的历史推进到笛卡尔时代,就开始进入了以人及人的世界的认识(思想)为关注中心的阶段。尤其值得提及的是,笛卡尔的整个研究和理论建构不是以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人为出发点,而是以生活世界中的个体人——“我”为出发点,从而开启了西方哲学研究生活世界中的人及生活世界的时代。这是这些“开始”和“开启”为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阿鲁玖诺娃. 语言与人的世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北京大学哲学系.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笛卡尔. 谈谈方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希尔贝克 G. & 伊耶 N. 西方哲学史[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Veitch, J. *The Meditations and Selections from the Principles of René Descartes*[M]. La Salle: Open Court, 1948.

收稿日期:2013-01-02

【责任编辑 李洪儒】